

Finally, they labour everywhere

for the union and agreement

of the democratic parties

of all countries.

The Com-

tain

to conquer, to secure our rights and aims.

They openly declare that

their ends can be attained

only by the forcible

overthrow of all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

Let the ruling classes tremble

at a Communistic revolution.

The proletarian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

They have a world to win.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

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

团结和协调。

共产党人不屑于

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他们公开宣布：

他们的目的

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

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统治阶级

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

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本书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郑 谦◎主编

中国共产党 指导思想发展史

第一卷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本书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郑 谦◎主编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黄一兵◎著

中国共产党 指导思想发展史

第一卷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发展史. 第1卷 / 郑谦主编；黄一兵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406-8530-0

I. ①中… II. ①郑… ②黄…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指导思想—思想史 IV. ① 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6671号

总策划：王桂科
执行策划：何祖敏 应中伟
责任编辑：邓祥俊 靳淑敏
策划编辑：邓祥俊
责任技编：吴伟腾
装帧设计：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510075

网址：<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中山市南蓢大车工业区东桠片)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6印张 520 000字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06-8530-0

定价：45.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020-87621848

目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党的指导思想之源 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岁月 1

一、中国思想界前所未有的文化觉醒 1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4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纷争和抉择 7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10

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 10

二、党的创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地位的确立 12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导思想基本问题的提出 16

第一节 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最初探索 16

一、革命实践与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16

二、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初步形成 20

三、革命实践中的分歧和错误理论的出现 26

第二节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曲折探索历程 30

一、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30

二、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道路问题的提出 34

三、在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的曲折 40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发 46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46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 46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发 49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59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地位的确立和政策思想的发展 59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拓展 61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 65

第一节 党对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 65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提出 65

二、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化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 67

第二节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规律 71

一、中国革命规律的初步认识和不足 71

二、“分两步走”战略构想的系统形成 74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及其基本特征 77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基本内涵 77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基本特点 79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87

第一节 党的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分析观的形成 87

一、正确分析社会各阶级任务的提出 87

二、党的阶级分析观初步发展 89

三、党对社会各阶级分析进入成熟阶段 92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94

一、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认识和结论 94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97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101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104

第六章 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107

第一节 “城市中心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07

一、 “城市中心论”的缘起	107
二、 “城市中心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108
三、 党对“城市中心论”实践结果的总结	115
第二节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确立	118
一、 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模式主张的提出	118
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最初形态	119
三、“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和基本内涵	122
第三节 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127
一、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开始形成	127
二、 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全面的阐发	130
第四节 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思想	135
一、 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建设思想	135
二、 党的根据地建设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142

第七章 统一战线思想 153

第一节 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	153
一、 确立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基本策略	153
二、 初步提出了统一战线中“领导权”和“独立自主”的问题	157
三、 确立党内合作的形式	161
第二节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策略	164
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确立	164
二、 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联盟	168
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的全面阐述	170
第三节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	176
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概念的提出	176
二、 系统阐明了新形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177
三、 巩固和扩大工农联盟的策略思想	180
四、 推动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185
五、 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下的统一战线组织新形式	189
六、 正确处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关系的思想	195



第八章 武装斗争思想 198

第一节 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198
一、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思想提出和确立	198
二、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理论的基本内涵	201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09
一、确立无产阶级的战争观	209
二、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运用战争规律	215
第三节 人民军队的建设思想	218
一、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218
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224
三、政治工作的指导原则	229
第四节 人民战争的思想	237
一、兵民是胜利之本	237
二、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坚持长期人民战争的战略基地	239
三、人民战争武装力量的体制	242
第五节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247
一、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247
二、对作战形式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250
三、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作战方法的形成	251
四、战略进攻思想	255

第九章 党的建设思想 261

第一节 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261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思想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261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理论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	265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特点	270
第二节 党的思想建设	273
一、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突出特点	273
二、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	278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途径	284
第三节 党的组织建设	288
一、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288

二、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组织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292
三、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内容	295
第四节 党的作风建设	313
一、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313
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322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327
四、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334
第五节 党的领导的思想	342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342
二、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条件	346
三、党的领导活动的基本规律	347
四、党的领导工作的基本方法	349
五、党的领导的正确作风	351
第十章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353
第一节 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接受	353
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	353
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358
第二节 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思想	364
一、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战略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	364
二、要适时树立城市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的观点	365
三、提出“两个务必”的任务	368
四、发展生产和统一财政工作	372
第三节 坚持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努力	373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的阐发	373
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建构	378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认识和运用	387
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399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和党的指导思想之源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岁月

一、中国思想界前所未有的文化觉醒

20世纪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化的世纪。

中国人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20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仿佛只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黯淡的前景。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致使中国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者为了达到奴役和灭亡中国的目的，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对中国进行侵略。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也不惜投靠帝国主义，成为西方列强的代理人。孙中山领导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但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在袁世凯夺取民国政权以后，中国的政治环境更是每况愈下。他把辛亥革命在形式上取得的一点民主也消灭干净了，公然演出了复辟帝制的丑剧。袁世凯倒台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和纷争局面。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大军阀以“武力统一”为口号，小军阀以“保境安民”为借口，实际上都不过是争权夺利压迫人民。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给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破坏和无穷灾难。在1915年前后，中国连续发生了几次大的灾荒，更加深



了人民生活的苦难。

帝国主义的侵略也迫使中国逐步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9世纪60年代始，中国有了自己的民族工业。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经济有了更大发展。1895~1913年，全国新设厂矿548家，资本总额12 029.7万元，其中完全商办的厂矿463家，资本总额9082.1万元。随着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也得到成长和壮大。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增加到100万人以上。这表明，帝国主义在中国虽然发了横财，但也造就了反对它们的革命力量。

民族压迫与近代工业产生的下降与上升两条发展线索，构成近代中国社会整体运动的两种趋向。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结合，把中国推进黑暗的深渊；而民族工业、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又给中国前景带来光明。纵观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110年历史，近代中国在20世纪初（1901—1915年），可谓是沉沦到谷底。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演化，触发了思想界前所未有的文化觉醒。

大战期间，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第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以进化论为武器，发动了一场针对儒教、反对旧传统的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斗士们的思想非常激进，不承认传统权威和各种教条，要求打破精神枷锁，用“理性”批判和审视一切。人们习惯上称这场文化运动为“思想启蒙运动”。它与西方15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相比，在性质和内容上有一致性，即都是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然而，二者在发生的时机上有一些区别。西方启蒙运动是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作思想准备，而中国新文化运动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进行的思想补课。它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和国内军阀混战的背景下爆发，必然强化发动者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这场运动以新的历史内容，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思想前提和必要条件。

大战也暴露出西方文明的弊端，摧毁了中国人目中的偶像。残酷的战争，不仅使一千余万人暴尸沙场，两千余万人受伤致残，而且使多年积累的物质文明在短短的几年内几乎毁灭殆尽。梁启超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到达欧洲，游历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家。在《欧游心影录》中，他描述了欧洲出现的生产破坏、信仰危机、社会混乱和人民贫困的情景，慨叹

那里“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①。这不能不使一向醉心于学习西方的中国人感到震惊。

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许多先进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社会必须改造，而且要朝着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方向改造。梁启超在游历欧洲后得到的结论是：社会革命，恐怕是20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郑振铎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②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观念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向往到失望，从追求资本主义到对之否定。当时的《闽星》杂志写道：“共和民主政治不是我们的终局，世界大革命是决不可免的。”^③

心目中的偶像倒塌了，然而路还是要走下去的。在世界政治风云变幻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带来世界新的变化，使一批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的中国人开始重新探索改造社会的方案。这时，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先进中国人的注意，掀起了一股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

在当时，数以百计主张“社会改造”的刊物中，绝大多数的刊物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好感和向往。许多刊物，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或几篇专门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有些青年在文章中，把社会主义誉为“人类的福星”，并且认为，中国“没有建设则已，如果有建设必定要依着社会主义的原则”^④，而社会主义则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理想”^⑤。

社会主义成了最受欢迎的东西，但是应该承认，这一时期人们所谈论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相当庞杂的，除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包括当时被人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

^①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23），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12页。

^② 郑振铎：《现代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十一号，1920年2月11日。

^③ 《红潮滚过大西洋了》，《闽星》第二卷第八号，1920年1月26日。

^④ 张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七号，1919年12月。

^⑤ 《强权的斗争终局阶级的斗争开始了》，《闽星》第一卷第五号，1919年12月25日。



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受到了一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强烈影响。1920年上海的《共产党》月刊创刊时指出：“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向于崩破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①

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令人向往，可是这个社会到底是怎样的，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恰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转变的思想武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历经了内战和外国的武装干涉之后，在世界舞台上依然站稳了脚跟并且显示了勃勃生机，这和没落的西方资本主义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转向苏俄，转向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人对马克思及其学说很早就有接触。1902年9月至1906年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轮廓。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朱执信，在1905年11月《民报》第2期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学说。此外，孙中山、宋教仁、廖仲恺等在演说或文章中，都提到过马克思学说。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的刊物上也提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并摘译过他们的著作。但这些介绍是片段的、零碎的，有些甚至是曲解的，且介绍者也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有的还持批评态度。这些介绍没有也不可能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太大影响。到五四时期，在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的宣传和鼓动下，介绍马克思主义才成为不可阻挡的思想潮流。

在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是李大钊，一个是陈独秀。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政治上，他们都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人。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中

^① ①《短言》，《共产党》第一号，1920年11月7日。

起着主导作用。1918年7月至11月，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宣扬十月革命的价值和意义。五四运动后，他把由他主编的《新青年》六卷五号编成《马克思研究号》^①，并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首次在中国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李大钊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他说，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致分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其中，马克思的历史论揭示社会发展物质动因和阶级关系，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的经济论阐明“余工余值说”，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和“资本家掠夺劳工的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原理观察现代社会的经济状况，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进行分析研究，预见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然后断言“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由此，李大钊强调说，马克思的“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此后，李大钊还发表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等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他还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师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他把唯物史观作为宣传重点，充分反映了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指导的迫切心情。

与李大钊不同，陈独秀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时间上稍晚些。但由于陈独秀长期主编《新青年》，且在新文化运动中已有一定的声誉，所以很快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1920年3月，他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对马尔塞斯的理论作了某些批判，同时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① 《马克思研究号》出版的时间，刊面标明的是1919年5月，据考证，当为1919年9月。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页，《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题解。《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1~7节刊于《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8~11节刊于第6卷第6号，第6号标明的出版时间为1919年11月1日。



持有保留态度。在此后的《劳动者的觉悟》演说中，陈独秀已表达了“劳动创造世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可贵”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强调，古人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应当倒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才是正理。^①

当然，陈独秀思想的真正变化，即从评介、赞同，转向拥护、宣传社会主义，是从1920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一文开始的。在该文中，陈独秀批判无政府主义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强权、反对国家的观点，指出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的存在，“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这表明他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立场，明确赞成马克思主义“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的观点。^②

陈独秀有着反对军阀统治、谋求民众幸福的历史使命感和理想追求。作为一位具有强烈行动气质的革命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情有独钟。他创办刊物、组织团体、撰写文章，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与陈独秀相比，李大钊最大的特点在于他树立了坚定的唯物史观，相信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伟大作用，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求，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③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投身于人民群众之中。

除李大钊、陈独秀外，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李达、杨匏安、李汉俊等也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著作，推动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本书，寄回国内出版。其中《马克思经济学说》，被李大钊领导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列为研读书目。杨匏安回国后，于1919年10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

① 《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出版。

② 《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出版。

③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原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出版。

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等文章。前者称赞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社会主义经典”；后者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李汉俊在1919年至中共成立前两年多时间中，翻译和写作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约六十多篇。还有，进步报人邵飘萍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过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纷争和抉择

五四时期，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中，有的不但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是真理，而且认为它是改造中国的利器；有的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西方的学理来涉猎，并不同中国实际相联系；有的则是为了预防中国走上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路而对它进行研究。就阶级属性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谋求解放的学说，它不会为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接受。这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当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它同中国命运的观察联系起来时，就不可能不发生争论。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开辟前进阵地的。

第一次论争是围绕中国的文化选择，即中国问题的解决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展开的。1919年7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思想界引发了一场从7月到9月的激烈辩论。胡适立论的基础是实验主义。他认为，当时“舆论界的最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他对流行的“空谈主义”非常反感。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李大钊和蓝公武撰文提出异议。在李大钊和蓝公武看来，所有的问题都交织在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结构中，而以期解决问题的主义则是需要通过社会实验去检验的思想主张。人们需要用主义作为判断形势和问题的标准，同时也作为解决这种彼此关联问题的工具。李大钊同意胡适的观点，即对实际的问题应认真地研究，不应含糊不清地空谈各种学说。但他不认为研究问题和谈论主义之间有什么根本矛盾。他指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共



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同时他还指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①

“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讨论。胡适劝说人们少谈些主义，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深刻革命就能解决他所说的问题。李大钊则指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指导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么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在这场争论中，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当时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具有积极作用。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进一步唤起思想界对中国前途的思考。1920年9月，张东荪在上海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后来又说，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严肃批评这一论调，形成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1921年5月，李达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中国是万国的商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②

在与张东荪等人的论争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照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优劣，实际上提出了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生产力的思想。李大钊指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③陈独秀也强调，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

^①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原载《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出版。

^②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原载《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出版。

^③ 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原载《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1921年3月20日出版。

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①。“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②。这说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论争中表达出的共同的制度选择，而这一制度的选择，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第三次论争，是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的。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它对于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启发人们的思想觉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强权、一切权威、一切国家，鼓吹无政府状态和绝对平均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大障碍。于是，在与张东荪等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还未结束之时，另一场同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交锋便开始了。在论战中，《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都发表专文，对无政府主义进行尖锐批评。1922年1月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还把批评无政府主义作为重要任务之一。

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主要围绕着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等问题展开。他们一方面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掠夺之下，早已痛不堪忍，忍不堪忍，具有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又指出，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因此，对于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国家必须彻底推翻，而对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则必须巩固和加强，这是由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此外，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在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思想，着重驳斥他们“绝对自由”的谬论，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规模较大。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论争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

^①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原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出版。

^②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词》，原载《广东群报》，1921年1月19日。